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施政報告新設委員會應多吸納工商專業人士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志強時評

特首梁振英的首份《施政報告》，新設立最少14個委員會或政策小組，就不同範疇的政策出謀獻策，被外界指「委員會治港」。實際上，港府過去透過委員會吸納工商專業人士或不同經驗人士參與政策建議，早有先例。《施政報告》新設立眾多委員會，其好處是可以令政府施政開放，避免閉門造車，做到集思廣益，為政府施政帶來新視野和新思維。各個委員會應吸納較多各個領域的工商專業人士參與，重視長遠規劃，從根本上解決多年積存的深層次問題。

《施政報告》提出成立最少14個委員會及小組研究政策，政圈中有人評為「委員會治港」，也有輿論將《施政報告》譏諷為「研究報告」。個別輿論甚至攻擊指，成立大量委員會，是為安插「梁粉」作「政治酬庸」云云。特首梁振英對此否認，解釋成立委員會是為諮詢持份者意見，不能沒聽取委員會意見便下決定。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反駁「政治酬庸」之說，指政府向來須包容，聽取不同工商專業人士意見，又強調政府向來皆有成立委員會，並非新事。

「行政吸納政治」的涵義

事實上，港府過去透過委員會吸納工商專業人士或社會人士參與政策建議，早有先例。關於港英時期香港的體制，有各種各樣的概括，比如劉兆佳稱為「仁慈獨

裁制」，這種體制形成了「隔離的官僚政治形態」；殷定國(G. B. Endecott)稱之為「諮詢性政府」；夏利斯(Peter Harris)稱之為「無政黨的行政國家」；金耀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在這些概括中，最有影響的恐怕是「行政吸納政治」之說。儘管金耀基並沒有給出「行政吸納政治」完整的定義，但其所謂「行政」就是政府管理體制，「政治」就是社會精英的參與。

金耀基在論文中指出：「在這個行政吸納政治模式運作中，英國的統治精英把政府外的，非英國的，特別是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精英，及時地吸納進不斷擴大的行政的決策機構中去，從而，一方面達到了『精英整合』的效果，一方面取得了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以是，在政府之外，香港始終沒有出現過具有威脅性的反對性的政

治力量，這是香港政治模式的特性，也是它政治安定的一個很根本性的原因。」

長遠規劃和產業政策仍有待研究

「行政吸納政治」，其實是一種「共識政治」的管理模式。所謂「共識政治」，就是指政府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吸納非政府系統中的一部分工商專業人士。所謂諮詢委員會，是就具體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向政府提供意見的組織，一般不納入政府建制，委員也是義務性質。隨着香港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政府機構日趨龐大複雜，各種諮詢委員會也相應地大幅度增加，現已達到400多個。其中包括「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醫務諮詢委員會」、「教育諮詢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航空諮詢委員會」、「港口諮詢委員會」、「工商專業諮詢委員會」、「外匯諮詢委員會」等等，不勝枚舉。

回歸後，前特首董建華當年也成立多個委員會，包括「策略發展委員會」、「創新科技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特設國際顧問委員會」等。其中，「特設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西門子、豐田汽車、匯豐、三菱銀行等國際商界及企業的傑出領袖。結果大家都知道，國際商界及企業的傑出領袖不一定得準香港社會經濟的脈，到了今天，香港的長遠規劃和

產業政策仍有待重新研究。

中產工商專業人士構成香港社會結構主體

因此，並非外來的高級和尚會念經，《施政報告》成立的眾多委員會，一方面應多吸納香港工商專業人士，另一方面也應與香港已有的400多個諮詢委員會有區別。

20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轉型，金融、物流、旅遊等行業飛速發展，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快速轉型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直接導致了香港中產工商專業人士階層的形成，並不斷壯大構成社會結構的主體。中產工商專業人士是掌握專業技術和文化知識較多的一個群體，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主力軍。他們作為知識和科技資源的主要載體，對香港經濟發展發揮着重大的作用。因此《施政報告》成立的眾多委員會，應多吸納香港工商專業人士參與。

新設立委員會應研究各領域長遠規劃

香港已有的400多個諮詢委員會可分為五大類：向部門首長提供意見的法定組織(例如「保護稀有動物諮詢委員會」)；向政府提供意見的法定組織(如「教育委員會」)；向部門首長提供意見的非法定組織

(如「勞工顧問委員會」)；向政府提供意見的非法定組織(如「交通諮詢委員會」)；以及負責執行某項事務的委員會(如「香港考試局」)。《施政報告》成立的眾多委員會，應與香港已有的400多個諮詢委員會有區別，否則，《施政報告》增加14個委員會或政策小組，不過是踵事增華而已，並無太大實質意義。

回歸近16年來，特區政府欠缺長遠規劃，患上「短視症」，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致施政非常被動。新政府重視長遠規劃，想從根本上解決多年積存的問題，成立委員會加以應對，其職責應該是對施政報告提出的藍圖，研究長遠規劃逐步落實，因此新設立委員會應研究各領域長遠規劃。但報告中大部分提及委員會及小組的篇幅，只列出有關工作方向，並無具體細節及完成諮詢和檢討日期。因此，政府下一步應對新設立的委員會確定具體職責細節，並為各個委員會定出「交功課」的時間表。



楊志強

荒謬的「少交十元稅不合作運動」

篤行

日前，筆者在街頭接過一張傳單，該傳單呼籲市民在繳交2012/13年度預繳稅時，每人少交10元稅，筆者莫名其妙，四處打探，原來又是去年年底反對派的愚民伎倆，是次牽頭的衛星組織是「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參與的還包括社民連及新民主同盟等激進政團。該運動發言人聲稱，此舉是抗議政府拒納民意，也促使3名局長下台。

反對派常常把公民抗命掛在口邊，只懂爭取他們心目中的所謂「民主自由意識」；是次運動卻明顯地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與社會對着幹，未有竭盡履行公民繳納稅款的責任，自打嘴巴。只顧權利，不履行義務，沒有成本，仿似用了晚膳卻不願付鈔的無賴，這可能是部分人想追求的，但可肯定的是這些荒謬行為不應在香港發生。

「不合作運動」發言人還厚顏地聲稱，政府絕少為市民逃稅10元而採取法律行動追討，其潛台詞為懲息及教唆他人作違法行為，「逃稅」是應繳稅而不繳稅，與法律相抵觸，此激進運動廣吹集結號，教唆犯法，鼓勵逃稅，根本是與本港奉公守法

的市民為敵，又是反對派「朕即法律」的獨裁暗喻，更可恥的是該運動的發言人是教協理事，身在教育界而其身不正，試問怎樣春風化雨？

準時交稅是每名納稅人的法定責任，政府因此才有足夠資源應對各類社會民生的需要，該混賬不合作運動今次動員只繳付部分稅款，下次又可繼續騎劫民意，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倒政府行動，企圖癱瘓政府正常運作及暢順的公共服務，最終損失的又是普羅大眾。我們不能縱容這股勢力囂張跋扈，目無法紀，更不能對政治流氓視若無睹。

香港是法治社會，全賴守法精神，若一小撮滋事份子因個人私利挑戰法律，更教唆他人同流合污，則是在蠶食社會的核心價值。「不合作運動」發起人準是「反對病毒」上腦，有破壞無建設，只喊着沒有成本而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的口號，10元雖不是甚麼大數目，然而，在知情的情況下逃稅卻是犯法，教唆逃稅更是知法犯法，聰明及守法的納稅人絕對不會助紂為虐，摧毀社會的價值觀。

中國傳統農曆新年將至，這本來一家團聚、喜慶歡樂時刻，然本港日前卻發生一起倫常慘案：一名疑丈夫有婚外情正在辦理離婚手續、感情破裂患抑鬱症的婦人，一時想不開上吊自縊，還連同年僅10歲的幼兒共赴黃泉。稚子無辜，卻成了父母不幸婚姻下的犧牲品，實在令人惋惜、心痛。更遺憾的是這樣的案件並不是首例，年前屯門亦有一婦人因戀上有婦之夫，為情所困，與大婆爭產失敗，為報復而攬抱一對13及12歲子女燒炭，結果小兒妹撒手人寰自己卻獲救，倖存的母親要承受失去兒女離心之痛，相信今後的歲月也不會好過。表面看這是兩個家庭的問題，但想深一層卻是社會問題的折射，值得人們探討、分析。

據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據顯示，近年香港離婚率不斷上升，而導致夫婦離離的原因不少是涉及第三者、婚外情。以前婚嫁是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時人們盲婚瞎嫁少有離異，婚後即使有分歧、磨擦，彼此都抱着忍讓、包容的態度。隨着時代變遷，當今社會離婚不再被看作是不光彩的事，不可否認現代人對婚姻的质量有了更高的期望，過日子不再僅僅是繁衍後代這麼簡單，而是追求自我價值、生活質素，若有一方未能滿足，就容易讓第三者插足。加上如今女性多出外工作，有一定的經濟收入，夫妻一旦不能湊合，就會選擇分開。有道是：美好婚姻需要刻意經營、維護。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承諾，已有孩子的夫婦，當婚姻亮起紅燈時，更不能失去理智，將子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財產，傷害他們。大家不妨心平氣和地分手、好聚好散。這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應引起政府重視。

時下離婚率高企原因之一，和一部分人見異思遷、喜新厭舊分不開。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造就了一批新富豪，回顧他/她們的奮鬥史，都離不開另一半的扶持。惜有些男士發達了，卻開始嫌棄糟糠之妻，可謂「共患難易，共富貴難」。對此現象筆者寫了一首順口溜：「富商離婚何其多，共富離離何其多，共苦拚搏受折磨；財富增長夢想變，同甘難成無奈何？」維持永久的婚姻確實不易，關鍵是雙方互讓互諒、互相尊重，有句俗語說得好：「家不是講理的地方，家該是講愛的地方」。欲讓婚姻長久，兩人相處更要講究技巧和方式，不妨將對方的優點放大，把缺點縮小，讓愛常新、讓愛永恆，這樣才能締造美滿的婚姻。

奧巴馬調整對華政策勢在必行

蒯轅元

奧巴馬第二任期大幕已開啟，鐵娘子希拉里國務卿即將抱病謝幕，候任國務卿克里將接替上場。希拉里離去，克里上任，是否意味着奧巴馬第二任期的對華政策將出現調整呢？答案應是肯定的。理據有二：一是大勢所趨，亞太穩定形勢、安全危機日趨嚴峻，已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為了美國的經濟復甦和增加就業，應順勢調整對華政策，這是美國國家利益和亞太戰略利益的需要；二是強勢主導對華政策、風頭蓋過奧巴馬的希拉里離職，為奧巴馬、克里調整對華政策創造了契機和條件。

從曾連任兩屆總統的里根、克林頓、小布什的對華政策來看，似有規律可循。他們在第一任期都採取了強硬的對華政策，把中國視為敵人、對手、戰略競爭者，但在第二任期尤其在最後2年都大緩和同中國的關係並調整了對華政策，把中國視為朋友、夥伴、合作者。特別是克林頓、小布什在任後期，更把中國視為經濟合作夥伴、戰略合作朋友，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更對李登輝、陳水扁搞「台獨」採取了嚴厲的壓制政策，加強和發展了中美友好關係。輿論和學者曾把里根、克林頓、小布什對華政策轉變，借用股市用語歸結為「低開高走」。可以預期的，是奧巴馬在第一任期因希拉里強勢而導致「高開低走」的對華政策，在其第二任期勢將遵循這一「低開高走」的規律，向中美友好合作、共贏濟世方向發展。奧巴馬選擇克里擔任國務卿就是向中國、向國際社會發出要改善緊蹙的中美關係的明確信號。克里正是堪當如此大任的二人選。

中美關係將向合作共贏方向發展

奧巴馬第一任期之初，原本已選擇繼承前總統克林頓的對華政策路線，承接小布什的對華友好關係，加之亞太所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重創美國，美國需要同保持經濟強勁穩定增長的亞洲尤其是中國加強合作，擴大經貿交流，以緩解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和美國的經濟衰退。因此，奧巴馬急需需要擴大出口，增加就業，這就注定政府必須加強同中國友好合作。這正是奧巴馬「重返亞洲戰略」的初衷和主要戰略目標。舉世皆知，奧巴馬上任後不久就開始向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的蜜月期。

然而，好景不長，希拉里竭力推行帶有冷戰思維的對華政策，致使中美關係越來越緊張。缺乏執政經驗，尤其缺乏外交經驗的奧巴馬，特別依賴曾經的美國第一夫人且經驗豐富的希拉里。因此，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深深打上希拉里的印記，希拉里的風頭在國內國際都蓋過了奧巴馬。事實上，希拉里的外交政策主張和風格並非奧巴馬所樂見，奧巴馬卻又很無奈。出於民主黨利益的需要、國內政治的需要、奧巴馬競選連任的需要，奧巴馬只能默認希拉里的作為。希拉里當初迫於國內國際的危機曾表現出要與中國「同舟共濟」的友好態度，後來態度變了，顯露出「鐵娘子」本色，第一個出來宣佈「重返亞洲戰略」，不斷對中國責難、施壓，採取遏制中國的強硬立場。這在希拉里主導美國外交重點配合軍事戰略重心轉移亞洲表現得非常充分。希拉里強勢插手南海問題，不斷對中國緊逼施壓，唆使越南、菲律賓挑釁中國，挑撥東盟同中國的關係；在釣魚島爭端方面，偏袒縱容日本，第一個高調宣稱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範圍，致使釣魚島危機日益加深。

「重返亞洲」應為經濟發展而非政治利益

令人欣喜地看到，希拉里在謝幕之前，對其4年打壓中國對華政策有所反思，留下了警世的忠告。希拉里終於意識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不僅有賴於軍事實力，更有賴於經濟實力。因此，提出「經濟主導外交」，要調整和升級美國的外交政策和重點，以促進美國的經濟利益；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轉移亞太，其主旨應是尋求經濟發展而非政治利益。她也終於看出，中國與英美等通過軍事擴張而崛起的大



蒯轅元

國不同，是依靠貿易而崛起的，值得關注。希拉里見地深刻的離職留聲，可謂回歸理性、符合世情、符合美國利益，是留給奧巴馬和繼任國務卿的外交遺產。

希拉里離任，把外交主導權交還給奧巴馬，或將引導奧巴馬向前總統克林頓和小布什第二任期對華政策路線回歸，也是向奧巴馬推行對華友好合作的初衷回歸。可以期待奧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對華政策會作務實調整，漸進地回到友好合作、互惠共贏的建設性軌道。

奧巴馬總統選擇的候任國務卿克里，不僅有長期主持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豐富經驗，而且是一位理性、務實、溫和、善於談判溝通的政治家。想當年，他參加總統競選時所主張的對華政策，完全是克林頓第二任期對華政策的翻版。可以期待克里上任後會一改前任強勢施壓的做法，協助奧巴馬調整對華政策，為中美關係的穩定、健康、友好、合作發展做出貢獻，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做出努力。

摩擦和曲折仍不可避免

必須看到奧巴馬、克里代表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中美關係的新發展可以期待，但中美關係發展中的摩擦和曲折仍會發生，不可避免。更何況極端自負的美國，對中國的崛起，又表現出極為不自信，對中國的猜忌、恐懼油然而生。加之國會內的反對黨總是竭力干預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影響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最近國會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額外添加涉華內容就可見一斑。中美關係要消除猜忌、懷疑、對立，建立政治互信、戰略互信、戰略合作的夥伴關係，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理性處理婚姻問題

方潤華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日本央行不斷追加貨幣寬鬆措施的勢頭近來日益猛烈，主因是安倍晉三首相為代表的日本政府高官持續、公然對央行施壓的結果。然而，安倍政府激進誘導日圓貶值的手法，開始招致國內外質疑和不滿。

日本現任央行行長白川方明將於今年4月8日卸任，而安倍已不斷放言，繼任央行行長人選的必要條件是認同「安倍經濟學」，其核心要素即不斷寬鬆貨幣政策，驅動物價上漲以克服通縮。在央行不斷放水的姿態下，日圓走低將是長期趨勢，而目前外匯市場的表現也正是如此。

安倍上台後，對白川方明的慎重風格非常不滿，多次以強硬手法要求日本央行配合他提出的克服通縮激進療法，暗示央行應該無限限制地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為此，安倍要求央行與政府共同克服通縮簽署共同協議書，並在協議內容中明確寫入「2%」的通脹目標。受此影響，1月18日東京外匯市場日圓對美元匯率一度達到90日圓對1美元的水平，創2010年6月以來日圓對美元匯率新低。日圓對歐元匯率也跌至1

日本貨幣貶值政策遭質疑

年8個月來新低。日圓快速走低已導致日本國內燃料價格持續上漲。日本普通汽油價格已連續6周環比上漲。此外，進口燃料價格上漲使核電比重急劇下降的日本電力公司運營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將通過提高電費轉嫁到企業和消費者頭上。

將觸發新一輪「貨幣戰爭」

海外也不斷有聲音對安倍政府公開干預日圓匯率的作法提出質疑。德國財長朔伊布勒1月17日在德國聯邦議會發言時表示，安倍政府主張的貨幣寬鬆政策將使全球市場流動性過剩，他對此非常擔心。朔伊布勒還質疑，安倍政府對央行的主要職能存在誤解。俄羅斯央行第一副行長烏留卡耶夫1月16日表示，日本新政府的金融政策非常具有保護主義色彩，日圓急劇貶值可能成為新一輪「貨幣戰爭」的導火索。

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重合度高的韓國也對日圓走向表示不安。韓國央行行長金仲秀警告說，如果日圓匯率大幅下跌衝擊到韓國出口和實體經

濟，韓國央行將採取干預措施。

日本政府人為操縱日圓匯率的作法，可能導致新一輪主要通貨間的貶值大戰，其後果將不堪設想。美國汽車政策會議1月17日向奧巴馬政府提出一項申請，要求美政府對日本政府推行日圓貶值政策、傷害美國利益的做法實行制裁。由美國通用汽車(GM)等三家最大汽車製造商構成的「美國汽車政策會議」發表的聲明說：「奪取了政權的日本自民黨，採取日圓貶值的政策犧牲貿易對手的利益，以此來刺激日本經濟的成長，企圖推行讓「鄰居貧窮化」的政策。」該聲明還呼籲奧巴馬政府：「絕對不能接受日本這樣的政策，必須採取對抗措施。」

安倍目前正在積極推行日圓貶值政策，以刺激日本的出口，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一措施與同樣在執行「美元貶值」政策的奧巴馬政權相碰撞，這將使得美日兩國即將爆發一場匯率之戰。而美國汽車政策會議的這一聲明，反映了美國最大製造業對安倍政權的高度警惕。